

文史哲研究丛刊

周易的思想体例

季 蒙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文史哲研究丛刊

周易的思想体例

季 蒙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易的思想体例 / 季蒙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6

(文史哲研究丛刊)

ISBN 978-7-5325-8851-0

I. ①周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《周易》—研究 IV. ①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10961 号

周易的思想体例

季 蒙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3 字数 16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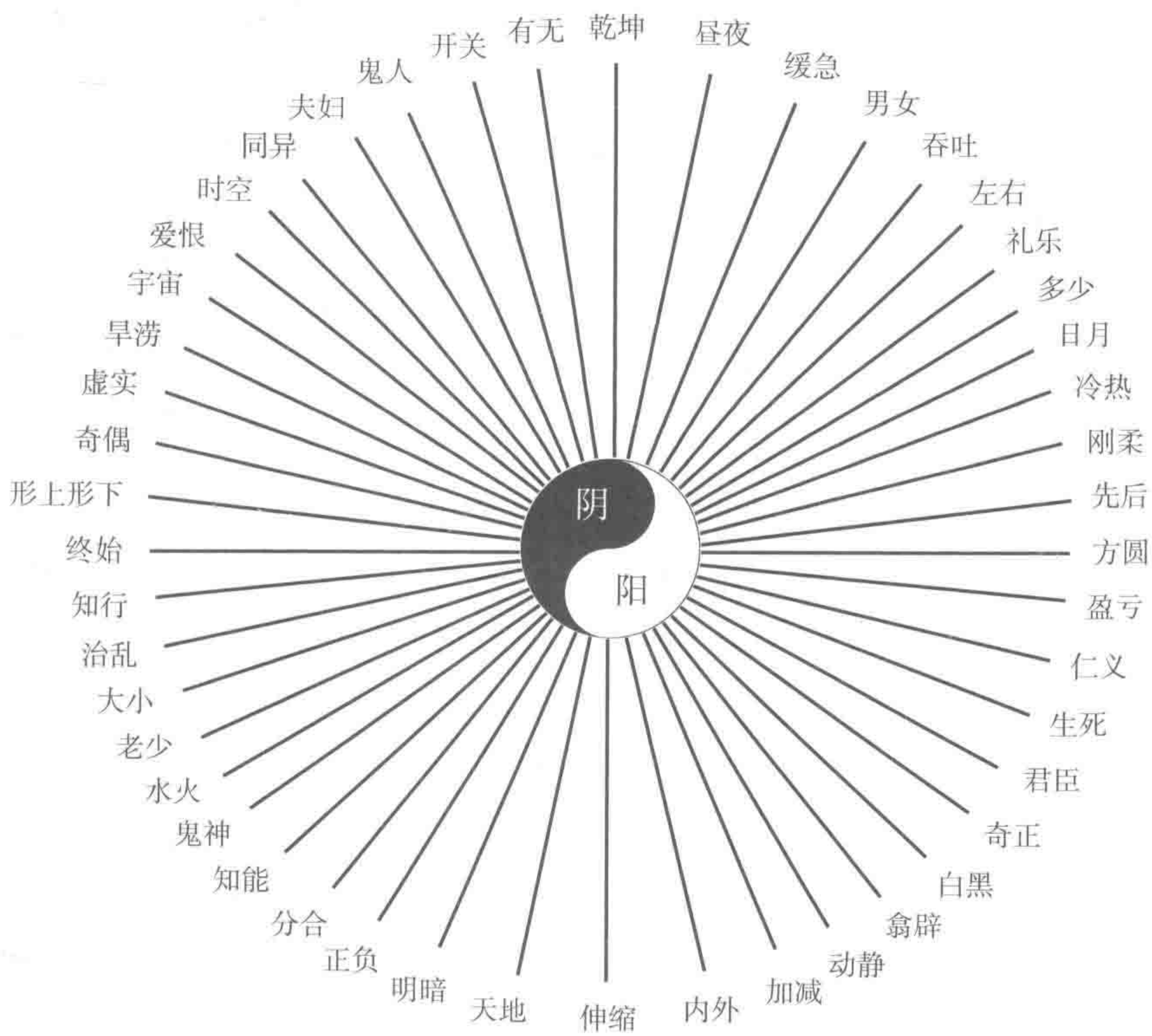
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500

ISBN 978-7-5325-8851-0

B·1058 定价: 39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

阴阳一图

前 言

《周易》的研究有久远的历史。以中国的情况论之，大致可以分为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。古代部分又是传统的研究部分，这里面包括对《周易》经典的解释与发挥，既有义理的，又有象数的。从解释的文本来说，历史上有三种最为基本和重要，即孔颖达的《周易正义》，李鼎祚的《周易集解》和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。这是因为，孔颖达的《周易》注疏是在集中了前代《周易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抉择而定的，从而使历史中《周易》典籍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定本，这是基础工作。具体情况在《周易正义》序中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孔颖达注《易》偏重于义理一路，以王弼注为底本。这样，在象数方面就不着重。而李鼎祚的《周易集解》，以保存汉易著名，正好在象数方面对《周易正义》形成补充，所以留存至今，成为一部相当基本的文献。于是义理、象数两方面乃得以完全。但是王弼死的时候年纪很轻，在学问的厚积上难免有一些问题，虽然孔疏选择王注为所本有一定的考虑，但其中的不足历来学者也多有议论。当然，宋儒对孔疏《周易》的非议含有排释老的因素。孔氏《周易正义》与李氏《周易集解》基本代表了唐以前的《周易》解释情况和水平，而宋以后理学时代最基本的文本解释则是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。

虽然注解十分简易,但是代表了理学的基本态度与观点,而且是在吸收前人易学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,比如《伊川易传》等。明清以后,易学研究有强烈的朴学实证色彩,开始了另一个时代。

关于易学的发挥和旁支更为繁复,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。比如《周易乾凿度》一书,郑玄注,有乾隆丙子(1756)雅雨堂版。前有德州卢见曾序,说到对待纬书的不同态度,认为先秦纬自有其价值,《乾凿度》就是一例。但这还是就易义发挥的。像汉扬雄的《太玄》,更是直接仿照《周易》的形式自作的一部书。但是从数上来说,《周易》是八八六十四数,而《太玄》是九九八十一数,只是《太玄》远没有《周易》那样自圆,无论是算法上还是文本方面,都有很多不对应的地方。宋司马光为《太玄》详细作注,而他自己也作有《潜虚》一书。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着重范数、名范。《潜虚》是五十五数。在配数方面,历代的著作还不少,像蔡沈的《洪范皇极》就是一例,他是参照《尚书》洪范九畴按九九八十一数配的;北宋邵雍的《皇极经世书》也是在象数方面很着力的著作。象数的历史十分久远,它是中国思维中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方式。一直到现代,始终贯穿在人文的各个分支中。有一点须注意的,就是象数的配法,了解了这一体例,各种学说就不复杂。比如汉京房的易学,就是把天文、人事、日用等各个方面配在一起,其旨就是为了用统一体例给宇宙人事一个大一统的说法和解释。因此,数与象的关系,就是一个辐射分殊的关系。数是中间的一,而象是一切方面的。如气味、声音、律吕、性情等各个分支。这样,只要我们做出一份详细的象数表,就如历史年表那样,人文中一切生活及知识部门的统一就清楚了。所以,象数与义理并不是相对的两个,而是《易》的自然生发的阴阳面,最关键的是对中土的思维首先要做到达意。

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历史中的事物,在感性认识及达意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。所以才经常出现测量不准的误差,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。

古代关于《易》的研究、解释与发挥过繁,因为易与中土一切人文分支胶合在一起,所以这里根本无法列举,在《四库全书》及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等丛书中,保存有大量易学文本,可以参看。需要说明的是,二十世纪以后,中国的易学研究与传统相比,发生了很大变化,虽然这些研究并不一定很准确的当。如新文化运动时期,古史辩派讨论《周易》的一些论文,当时是以打破古史中的陈说为务,他们攻击和否定伏羲画卦、文王重卦、周公作爻辞、孔子作十翼等说法,但是这与时世背景有关系,所以说,古史辩派在文化历史上的意义较学术上的意义为大。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总是获得与疑古派意见相反的证明,比如最新从王家台出土的秦简《归藏易》,就说明《易》的情况相当原始久远,更有早于《周易》系统的。可参见《周易研究》二〇〇一年二期有关论文。关于二十世纪借用易学发挥构成自己学说思想的,最著名的是熊十力。他在《新唯识论》《体用论》《乾坤衍》等书中讲的翕辟成变,借《易》申说宇宙构建模式等义,曾产生很大影响。建国以后的易学研究曾受到唯物论的影响,另外考古发现也起过重要的作用。关于《周易》的文化史与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少。这里面较著名的有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《周易大传今注》等著作,还有李镜池《周易探源》《周易通义》等作品。朱伯崑在《周易》哲学史研究方面是较有代表性的。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《周易》,则有邓球柏的《帛书周易校释》,讨论解释较详,是很好的参考。《文物》杂志中也有很多相关资料。

现代《周易》的研究不仅限于大陆,海外于此也很有发展。而

且范围、方面很广,较注重学科的比较与交叉。比如《周易研究》二〇〇二年一期讨论遗传算法与《易》算法问题的论文。概要言之,易学与哲学、文化学、人类学、诠释学、历史社会学、美学、文学、史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计算数学、生物医学、天文学等各个学科,在现代学界都发生了广泛的交接。比如有讨论《易》与推类逻辑、《易》与心理分析的研究方向。现在瑞士南部阿斯科纳有一个爱诺斯基金会,《周易研究》二〇〇一年三期有专文介绍,是一个与《易》有关的组织。海外与《易》有关系的组织还有若干,如美国成中英国际《易经》学会,以及史密斯办的《周易网络》杂志、比利时《世界太极科学》、法国“周易中心”等。研究专著也有一些,如美国卡罗尔·安森《易经的哲学》、德国卫德明《易经八讲》《易经中的天地人》等著述。但是海外研究《周易》的,仍然是以日韩为多。韩国与日本的研究,较多地以中国为参考坐标。比如韩国讨论熊十力易学,以及新儒学、《易》与中哲史的论文就不少。当今世界上国际易学研究的情况,基本上可以从大陆办的《周易研究》反映出来,发表论文极多,另外还不断介绍新出版的《周易》研究专著,可以参考,这里不能赘引。另外刘大钧有近百年易学研究回顾的专文,见二〇〇一年一期,也可以参考。据称现在已有与《易》相关的互联网站三百多个。

关于易学西传的历史也有几百年,比较著名的例子是莱布尼茨,据说他从《易》卦爻阴阳性得到启发,用二进制造了一架计算机,他想把自己的发明献给康熙皇帝而未果。黑格尔在《哲学史讲演录》中也讲到了《周易》。早期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学说思想可能用的是传教士的译本。据统计《周易》的译本目前有二十多种。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中曾记述过当时来华传教士勤奋研读中国典籍

的情况。但是,中国经典的基本特性是它永远不能离开解释,而且历史中的解释是逐代堆叠的。因此,真正要译介中国的经籍,就只能把像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典籍完全翻译才行。否则,对中国学术中枢的触碰,不是猎奇的,便是猜测的。另外有一点可以注意的是,在鸦片战争以前,域外学者对中国学问还能够持比较认真的讨论态度,比如最近出版的《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》,作者比较认真地讨论到汉语言的问题。且不仅仅是在语言领域,在一切文化学术部门与分科中,比如经济、文学等,都有过比较慎重的对待。但是随着近代中国在世界上声誉的不断下跌,认真的情况也就渐次损失了。这些历史中的学术情况,我们也须有一个估量。

《周易》在历史中的研究情况既然是这样,那么再做《周易》研究意义何在,又有哪些工作还可以做呢?事实上,这就触及到了最实质的问题,那就是,历史中的学问,在人文史中本身是有一个升降的,即历史学问(如《周易》)并不机械地、直线地随时间推移而进展,有时候反而发生偏离。比如易学,自近代以来,情况就比较乱,使人无所适从。而且有很多江湖性的东西。因此,《周易》的本体必须还原。因为易学是最原始也最朴素的,它的连绵性非常强,只有把《周易》最基本的东西认清楚,我们才有可能确立一个坐标,这就是易学的体例。事实是,《周易》本身是很难穷尽的,它可以无限衍展,这就像辐射,我们先要把辐射源考定清楚,这是基础的工作。有了这一个起步,即正始,那么下面无论推展多远,我们都有了一个始点和依托,这就是《周易》的基本思想的作用。必须说明,二十世纪的学术中有些因素是破坏性的,比如古史辩派,很多结果与考古相左。之所以不能有建设性,还是因为对人文本身的性质不能了解,所以也就不能自信,相对于历史中的成绩反而回去了不少。

另外须说明的是,国外的东方学、汉学研究虽然可以参考,但毕竟不能取代中学的传统方法与积累。因为汉学家在感性与达意上有时候会有问题,这些都是可以估量的。关键还是学问本身的径直考察,我们要用自己的思考去测量。所以这一次研究《周易》,就是打算把易学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重新确认清楚,并讨论它的可能走向。

《周易》研究属人文科学,人文科学虽然是软科学,但是牵涉面极广,是不可缺少的基础。案原始《易》问卜吉凶,考其起源,还是出于人的不安全感,从这里来看,《易》本来就是出于实用的,而且《易》作为忧患之书,其原始性质保留下来,不断发展,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。关于《易》的很多原始情况,很早就已不可考了。比如孔颖达注解《周易》时,解释卦的意思要引用纬书的说法,就能说明问题。但是古代问卜吉凶,并不止限于占卦一途,还有诸如龟卜、占梦等办法,这些在《周礼》中都有详细的载录,可以参看。从这里来分析,古代人有收集事情结果与占卜所示相互对证的传统,由此也就决定了一个广阔深厚的经验总结基础。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《周易》卦爻下所系之辞,便是古代生活中的实事系录。那么《周易》文本也只是一个参考文献,而最绝对的,还是卦符本身。比如说需卦上六爻说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,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:文王被囚羑里,纣王派几个人去监视他。从重卦来讲,应该是很原始的,因为排列组合本来是初民的能事。现在对《周易》的研究,常喜欢用文化人类学的手法来处置,其实并不妥当,还是应该本以传统的经学方法。比如章太炎在《馗书》中便引用人类学材料论到上古易数的情况,明显有不妥之处,可以参看。在易学长期的历史演进中,一般而论,《易》在政治历史上的影响是最大的。从这里可以

充分看到它的人文实用性,而这种人文实用性的消息,并没有消失。明末王夫之说他是从观卦进入易学的,观之义,就是考察人文历史之兴衰更替的。通古今之变,就是一种观,这反映了《易》为忧患之书。举例来说,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,取诸卦以治,从离卦到夬卦凡十三,其内容包括了渔业、农业、商业、政教、水陆交通运输、守备、兵器、建筑、丧葬、书籍文字等等,城市的兴起,文化的创建,都包括在里面。其实诸卦所显示的,就是一部人文史。由此,不夸张地说,人文生活中的一切具体、抽象内容,都可以用易符标出来。比如理学,朱子认为人文史是不断剥落退化的,但是剥到尽处,会有一个来复。这就是阴阳升降来回之理,毕竟理还在。依此类推,卦符的用处是无穷的,该摄的。至少中国人文史都可以这样处理,极为简易。这就是体例,是思想上的一种观法和处理。像良知、本体、性、理、道、气、无、玄、太极等等,都可以用大畜卦标示(象义)。这样,就真正达到了卦一分殊(诸象义)。所以华文化是一个辐射的“一”,最简单,也最繁复。这是其一。

由此,当我们把各个学科与知识部门理会为分殊的诸象义时,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现成的大一统体例语言。百科全书式的个体知识结构,也就是现成的。比如《道藏》里面的语言,是讲丹学、医学、武学、养生等等,但其语言与理学多相通,如道、气、理、性等关键字词,这就是体例语言。《老子》中的一句话,在武学中是太极拳,在理学中可能就是治心明性。比如“重为轻根、静为躁君”之类。我们可以在各种典藏文献中清理出一个专门的语库,而且有一个很明显也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:历史中的注如此发达,而注与所注之间,常常就是统一体例与学科分殊的关系。比如说一、二、三数,在形学中就是圆、方、勾股。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统一

象数表的问题,为什么中国数学史上总是以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呢?这就是因为象数思维的指导作用。几何是象,代数是数,如割圆术在中国古代数学中发展得就很繁复,而华文化就是很尚圆的,因为圆最奇妙。像太极拳,全是圆的力学的运用。数学并不是统一的,因为数的理念因人文系统会有所不一样,比如华文化中的算术,乃是一种轻重数学的东西,它不是绝对数学(理论上求绝对)。像九宫格可以无限衍分,分的细化程度随需要而升降。现代微积分实际上是数学上的一种让步处理。中国古代勾三股四弦五之说不能单从具体结果去理会,因为易学传统极注意配数,故而也极在意“象”之间的奇妙数关系。尤其从一到十数,更被注意。勾股弦不过是具体的几项“象”而已,而三、四、五数,都是很关节的元数。由一到十到无限之数,每一个数都有其分位,是不能乱的。因此二进制、十进制、十六进制等说法,还是一种外铄性的解说。因为根据易数的体例,就是阴阳奇偶轻重升降,十数的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奇数,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偶数的派生是很自然到位的。一、二更不用说。像十六,三十二、六十四、三百八十四等,就是自然的两仪疏分。我们通常说圆三百六十度,这是人为制定出来的,因为靠自然衍分,只能是三百八十四分,正当易数。三百六十度的制定可能还是为了方便。从各种配合情况来看,如果就易数学不断派衍下去,会不会导引出另一种数学系统也不一定。当然,易学的实用性不局限于此。

从思想上说,易数对中国的学术思维做了根本的定位,很难改变。即以卦爻结构来说,就能表明,中国的观念与其说是知识的,不如说是认识的。因为每个卦都有自然之象和人事之象两重“义”。自然之象是原始取象,人事之象是“命义”之象。重点在人

事,也就是人文一边。所谓万物之情者,盖指了解万物的情况与实情。所以中国古代思维,更偏重认识的功用,还不在知识一边,也就是说意义很重要。以经济来说,汉朝一石米可以五钱,这是民生宽裕的时候,碰上动乱之世,一石米高达万钱。经济轻重,与治乱轻重,说明决定价格的是意义,而不是价值。治世的一石米,与乱世的一石米,意义不同,有轻重升降。易学就常常称量这一类轻重升降,通过卦变爻变来“当”之。那么,对中国的思想与学说,也应尊重到:它的认识性质,通常先于它的知识性质。如此人文测量才测得准。像中国工艺技术的发展,就不是科学的,而是实学的。实学与科学是两套理念,即使现在,华人对技术还是实学的认取。比如科技这个词,就是从实学出发的。据说中国以外很少有此提法,这些都应该注意。

易学与各种文化学术部门的关系很繁,这里不能尽举。但是其中的实效性我们是完全看得清楚的。总体来说,易学在人文学科上的直接价值比在自然学科方面更现成,像中医与易学间的关联就是不言自明的。最主要的,是易学本身如果衍展下去,有可能长出新的学问。清代焦循是易学名家,在数学上也很有成绩。但是焦循对易的解释,完全用爻变坐实的方法,是否会有拘滞的一面,也须讨论。比如艮卦六二爻“六二,艮其腓”,注谓:“腓,犹匪也,谓兑四之艮初成节。”^①这样,每一个卦中的每一个具体的爻,都用其他卦的具体的爻之间的相互变动关系来坐实解释,虽然有严整的体例,但却限制了《易》变动无穷、无一定之宜的原义。这些

^① 焦循:《易章句》卷二,《雕菰楼易学五种》上册,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12年版,第76页。

是必须活看的。必须看到，名学与易学间的互动也不可忽视。比如《墨辩》取予之义，正能对解《易》卦爻取象予义的现象。虽然我们的重点放在先秦易学，但是《易》的边延本来不容易划定。是否就能机械切分出先秦以前之易和先秦以后之易，这些只能在研究展开以后再来不断调整了。

易学研究的难度主要在对《易》的始原很难确定。易学的很多基本内容历代学者只能凭推测等办法去处置，这种情况在孔颖达注疏《周易》时就如此。（如前已提及，孔颖达在解释卦的涵义时，引用《易纬乾凿度》的说法。）孔颖达引用纬书和老庄之学注《周易》的地方不止一处。现在的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论《易》的一些始原问题，虽然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说法、观点，但最终仍然是不能定论的。比如说易数的问题，就非常麻烦。以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为例，在注解“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”一条时，引用了晚近崔覲的说法，而李氏《集解》却是以保存汉易著名的。可见李注本身有抉择标准在里面，一定有所比较，并不是一味准以古代学说的，首先还是从易理考虑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古人治学的态度。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有，也就是说，《易》的原始，即使动用再先进的考古方法，也已经很难确证。但基本的情况，却大致不出《周易》文本本身所说的古人作《易》、仰观俯察等说法。因此，在易学的研究中就有一层分别，那就是，我们研究易学，重点是放在思想学说的考察上，是将它作为一个人文义理思维传统去对待。因为即使是《易》的各项原始制作情况都得到了实证，也仍然不能包括历代学者对易学的学说发挥，而后者显然才是真正的庞大的系统所在。这种情况在字学研究中也有，比如《说文解字》。最重要的，不是文字制作本身的原始事实情况，而是经学家对文字制作及内含之义

的系统的说法。这就是思想学说本身、思想学说之本体。所以我们的易学研究不是考古实证工作,重心还是在义理的工作上。

关于研究方法及技术思路,简言之是为了探求知识体例,因为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较重一统的。而在知识上这种统一又是历史事实,如前所说,用来统一的就是一贯的知识体例。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就十分明显地使我们看到,中国人文传统的各个知识部门是系统齐备的、自身配套的。这些学问部门牢固地统一在一起,贯穿于它们中间的就是体例。人文知识的体例是至关重要的,并不是每一种人文都有自属的体例及全备的系统。举例来说,如阴阳两仪,无论是在数学、医学、武学、经济、刑法、政治、历史种种领域中,都形成无处不在的辐射与分殊,那么阴阳就属于知识体例中的关键的一项。事实是,人类各个群体都发现了广泛的阴阳性。比如很多语言的词性就有阴阳性之分,像德语中的钥匙一词属阳性名词,而锁孔一词却属阴性名词。但是,把阴阳性全面发展为一种人文的却只有中国人文。易学及思维与一切学问知识部门领域相关,所以研究易学就是求得思维体例,就是为知识学问的一统做准备。比如易数学,它表明数学并不是统一的一般科学,数学也是一种具体的文化思维。关于这一点,此处不能细论。

这样,我们就需要贯通各个传统中国学问的门类。比如说名学、字学、史学、礼学等等,甚至包括自然物理在内。但归结起来,经学是统一的核心与灵魂。因为易学本身就是经学的,这就是“研究从性质、方法从类别”的原则。还要利用不同的方法,即以朴学论之,首先我们将它理解为义理对勘集合。通过这种方法的处理,使义理本身的情况得到最大程度的确定,而不是推断和猜测。举一个例子,《墨辩》中有“撝”这一条,义理上很重要。而《荀子·议

兵》中就有：“延则若莫邪之长刃，婴之者断；兑则若莫邪之利锋，当之者溃。”^①两相对勘，撓的意思和内涵就完全确定了。但是孙诒让在注解中却用了更费事的办法，并未用荀子之书。可见前辈大家在朴学方法上也还留有余地，并没有完全饱和。另外孙诒让解释《墨辩》中卧梦等条时，没有结合《周礼》中六梦之法的内容，而孙诒让是《周礼》权威。可见，前人遗留给我们的，只是一些方法范例，并没有到毫无余地的地步。这就是说，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可以作终结了断的。每一种方法都是在一定程度和限度内使用，其关键是“类性”要搞清楚，通过针对性的使用，便能发生宏伟的效果。

有一点是须说明的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自觉地尊重一个纯种原则，这不仅仅是别同异的要求，同时还有一个体与用的问题。因为没有种的纯正，就不可能有原发的成果。近世以来，东西学之间的比较、交接讨论，毕竟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时的事体，它属于用的层面，而长时段的易学（包括其他一切学问部门）传统之本体却是自属的，并没有与西学相涉，这是体的方面。体用的区别，我们有必要分清楚。两者之间固然有相扣的连环关系，但是如果自己本身不能独立地搞清楚，而用别种思维和学说来诠释，那么最终的诸如东西学的讨论也就不可能了。简言之，人文比较属于使用的层面和方面，而人文本体是自属的。它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比较，而是自身的推展。

前面说过，易学思维是历史中的一般思维，很难具体限定在哪一时代，作机械的朝代切分。而且也很难限定为某部具体的著作，

^① 《荀子·议兵》，《二十二子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321页。

因此研究重心放在思想体例上进行论述是明智的。先秦易学是以后历代易学的基本框架与体例，而易学又是中国传统思维领域的一个框架体例。体例作为一以贯之的东西，就像一部辞典，无论它的条目有多少，只要把握了辞典的体例，就可以随时使用，而不会觉得知识是无限的、难以把捉的。易学的基本体例，都是围绕阴阳两仪展开的。所以易学的难点不在于它自己有多少，而在于它作为基本体例可展开的限度，这就是唯至简乃可以至繁的道理。易之三义，简易一层就包含在其中。像历史中焦循的易学著作，就是探求易学体例的著作典范。之所以历史中发挥易学的著作那么多，而都能各圆其理，关键就在于易学自身可衍展的广阔性，即只要不是强行附会的，通常都可以落在易义的自然范围中。所以，说明易学的体例连绵性质，何以易学能接通各门历史学问，既是难点之所在，也是学术上最有价值和意义的要点。

就历史上所做的文献整理工作来说，汉代学者确实做了极为扎实的基础工作。刘歆父子校理群书，对经典的定本是经过抉择比照后作出的。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写本，与现在的通行本比较就多有歧出，可见汉时各种典籍确有多种本子流传。马王堆帛书，写本较今本更原朴、更朴野。虽然年代久远，极为珍贵，但学理上还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可靠。这一层是要说明的，即尊古也有一个原则抉择尺度。但本书的重心不在考订，而是放在义学。《周易》的义理系统，并不是一个只能猜测比附的对象，而是可以确定的，这是因为《易》从本性上说不是玄学，而是上古的文物，关键是摸清楚《周易》自身配套的学说理路，这一理路超不出六十四卦的范围。所谓六十四卦，也是由一个最基本的体例不断自身翻衍、排列组合而来的。所以任何一个易卦，都包含着